

说好的支持去哪儿了

国务院督查追问民间投资政策落地难

促进民间投资 专项督查

抓落实,是一切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中央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遭遇哪些落地慢、落地难?地方配套措施是否存在不同步、不到位?国务院派出的9个专项督查组在山西、吉林、四川、河北、重庆等地展开了督查追问。

屡遭“白眼”频“碰壁” 说好的支持去哪儿了

“现在民间投资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缺乏公平待遇。”重庆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坦言,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行业都不挣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业效益都不错,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也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白眼”频“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在规模上“重大轻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域上“先内后外”。

四川远舰建设集团董事长杨远见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多PPP项目就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很少有民企参与的份儿,有的地方直接告知‘优先考虑国企’。一方面是因为国企能从银行贷到更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政府也想避免引发道德风险质疑。我们申请过很多PPP项目,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在河北,一家民营焦化企业负责人反映

了同样的疑惑,“国务院明文要求,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但地方在化解‘僵尸企业’时,却只愿意卖给国企。宁可冰棍化掉,也不让别人吃掉。”

同样反映突出的,是到银行屡屡“碰壁”。“银行都会拉出一个规模排名,行业前20强可以放贷,中小民营企业只能‘靠边站’。”英利国际置业副总经理杨晓楠在督查组座谈时直言,民营企业贡献了80%以上新增就业,但最近两三年民企不仅排在国企后面,连外企地位都比不上。不能因为“出身”不一样,参与市场竞争的难度和结果就不一样。

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 政策卡在半空中

“在落实支持民间投资相关法律法规方面,存在规范性文件内容‘打架’,项目审批程序繁琐,甚至一些文件规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够到位,就加强市场监管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统筹考虑不足。”重庆市政府法制办高级法律专务谢建军表示。

从第一阶段对9省(区、市)实地督查的情况看,企业对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以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有不少“吐槽”,认为是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支持民间投资缺乏积极性。

山西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说,仅办理施工许可证就需提供52项资料和证件,办分项证件还要履行十余项手续,“所有证件办好需500份资料,等手续办好,商机早失了。”

青海央宗药业法人代表徐楠向督查组反映,公司开发了一款降血糖的藏药,研制花了六年,审批已经五年半了,相关部门迟迟拿不出审批结果,每次打电话催促,得到的答案总是“我们人手太紧”。“再这么拖下去,项目肯



定要黄了。”徐楠说。
“政策落实的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权、责、利的清晰划分与界定,中央把握大方向,地方应该出台实打实的、有针对性的实施细则。”学平大健康监事会主席周静瑜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印发之后,很多地方出台了配套文件,但具体该如何投资无从下手,最后出现就投资不足、投资乱象不足为奇了。

动真格、出实招、多让利 民间投资得“真金白银”

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地方动真格、出实招、多让利,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才能落实好,民营企业才能得到“真金白银”。

在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荣发集团董事长孙亚坤告诉前来走访的督查组:“作为吉林省扩权强县试点县,企业的审批手续基本可在农安县直接完成,甚至只需找一个部门,送一趟材料。以前三个月才能办成的手续,现在

三天就好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前来扎根发展。”

为推动政策“一竿子扎到底”,山西近期制定《全省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方案》,要求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每人联系1户民营企业,研究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助推企业发展。目前,各市县领导联系工作已陆续展开。

针对企业反映最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督查组发现,各地均由财政出资设立了多样化的基金、转贷金,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帮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同时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信贷品种,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江苏在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中开展“苏科贷”,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目前,全省80%以上研发投入、70%以上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由民营企业实施。重庆江津区则设立2亿元起始周转金,为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时提供“过桥”,预计今年可撬动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70亿元续贷。

(记者姜琳、华晖迪、董小红、李超、朱基钊、于佳欣、庞书纬、王自宸)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地震台网中心:对网上“震谣”要提高判别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荣启瀚)截至今年5月25日,我国大陆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9次,4级以上地震41次,相较于平均每年发生5级以上地震约20次和4级以上地震100余次的数据,今年的地震频度与往年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任潘怀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

【网传下次大地震会发生在青藏高原南部,是真的吗?】

潘怀文表示,青藏高原是现在地质构造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判断近期是否一定会发生非常巨大的地震,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依然难以得到清晰的认知。

据介绍,青藏高原的南坡、尼泊尔印度

一线,在历史上确是巨大地震频发的地段,每隔七八十年,就能找到一次平均7.5级以上巨大地震的记录。潘怀文说,在这样的地段加强防灾减灾准备十分必要。以上大部分地区位于我国边境线南部,并未延伸进我国内部。而在我国,青藏高原的内部也确实是大地震聚集发生地,是我们开展防震减灾工作的重点区域。

【全球或中国目前是否进入地震多发期?】

潘怀文介绍了两个特点。其一,从全球尺度来看,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之后,全球就进入了一个8级以上大地震多发时段;其二,从国内情况来看,自2001年发生在青海昆仑山口西的8.1级地震开始,我国大陆已经经历了两次8级以上地震、4次7级以上地震,确实处于一个强震多发的时段。但潘怀文强调

说,“平静时间段内也可能发生强烈地震,活跃时间段内也不是每年都会发生大地震。”

据介绍,以中国大陆为统计样本,以华北地区为例,当前就处在一个地震相对平静的时段。从1998年1月10日发生在河北张北县的6.2级地震之后,华北已有近18年的时间没有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

【网上各式地震消息,应怎么看?】

国家鼓励社会公众、团体开展有关地震预测预报的研究,但是我国防震减灾法等法律法规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地震预报只有通过国家来进行统一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布地震预报意见。

潘怀文说,网络是个开放空间,会有很多良莠不齐的信息,有很多不确定的信息甚至是错误信息和地震谣言,要提高对此类信息的判别能力。

【新标准即将实施,能否让建筑更安全?】

潘怀文表示,需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地震灾害。他告诉记者,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新一代《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将于6月1日开始实施。一般工业和民用建筑都必须按该标准执行。对于一些大型工程、生命线工程,还需要进行更高的抗震设计。

“一个明显变化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取消了上一代区划图中不设防的区域。”他介绍,自此全国所有地区都必须进行6度以上的抗震设防,而图上红色区域地震烈度较高,需进行更严格的抗震设计。

第二个特点是,这张图把各个区域的抗震设防要求明确到了乡镇级别。“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找到自己所处的区域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抗震设防。”潘怀文介绍。

各地加分“瘦身”,高考如何兼具公平与个性

24日,福建省出台《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从2018年起取消所有地方性加分项目。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广东、天津、上海、江苏、湖北等20余个省份公布了改革方案。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按照2014年底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文件精神,各地高考加分项目迎来“大瘦身”。

多省份清理地方性加分项目

“各地对高考加分项目的控制将日益趋严。除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将会越来越少。”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按照意见的要求,部分已经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的省份已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优秀学生等全国性加分项目,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等多个省份将清理或逐步取消所有地方性加分项目。

目前,绝大多数省份保留的基本是意见规定保留的全国性加分项目,包括“烈士子女”“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等。

已经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的省份保留的地方性加分项目主要有“少数民族考生”“农村独生子女加分”等,但均有所调整或缩减使用范围。如天津提出,“少数民族考生”的地方性加

分政策自2015年1月1日起只适用于市属院校在本市招生时使用,加分分值为5分。

高考加分未来或呈现三大趋势

高考加分本意是为促进教育公平和选拔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甚至“招生黑幕”。未来高考加分制度会出现怎样的走向?有关专家提出可能出现三个趋势。

一是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等特殊考生外,加分项目进一步收紧甚至取消。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赵俊芳说,一些省份以往的加分照顾了部分特殊群体,但执行过程中容易混入各种复杂因素,被人作为操作,影响高考公平。高考是人才选拔的过程,要确保公平、公开、公正,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等特殊考生外,加分项目将进一步收紧甚至消失。

从目前一些高校的招录情况来看,这一趋向已有显现。吉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鹤说,吉林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投档看加分、录取专业不看加分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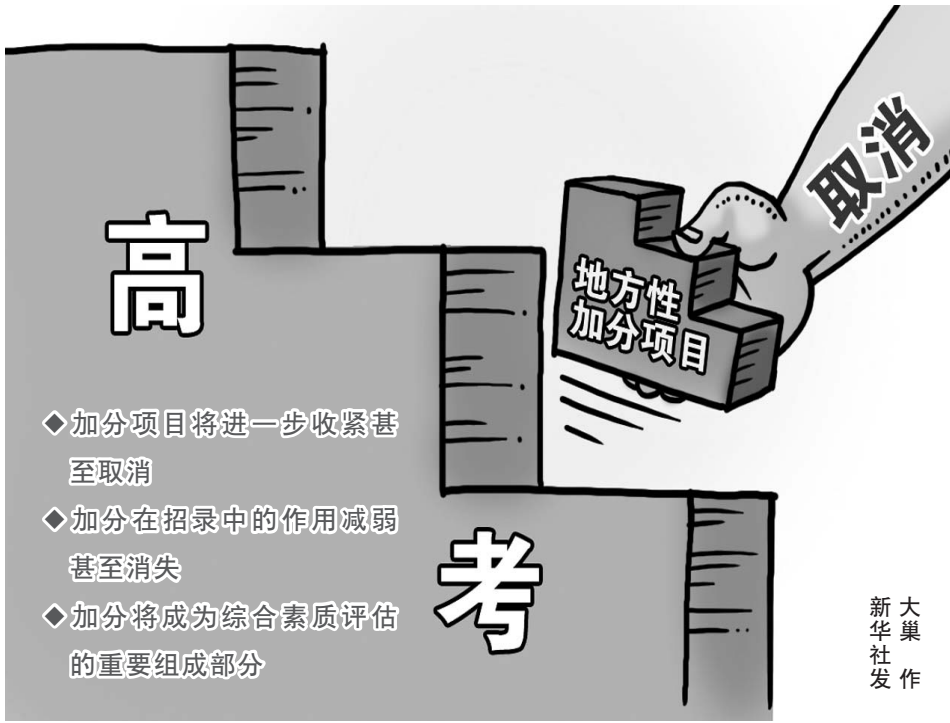
中国传媒大学的招生章程规定中提到,学校在提档时,原则上承认省级招办报教育部备案的全国性加分项目,但录取时以实际高考成绩为准。实考分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

三是随着信用体系建立完善,加分成为综合素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生认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类似于加分的推荐制度。随着未来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学生、家长或者学校如果作假,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影响声誉。

未来如何体现教育个性化?

多位专家认为,在取消加分、促进公平的



同时,也不应忽视学生个性化培养。一方面,高考改革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制度设计应该更为科学、合理、细化,不单纯从学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角度衡量考生,更要从考生某一方面的潜质、某一学科的素养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的了解,为具有可培养潜质的专才留出成长空间;另一方面,高中教育中,不应因取消加分项目而忽视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要积极鼓励学生在学习之余广泛培养兴趣爱好,否则又将重回应试教育。

杨东平说,取消地方性加分,减少全国性加分的项目是大趋势。这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现在,一些地方试行的综合评价

录取模式,对加分的择优功能正在形成替代。目前,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的研究型大学,都在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试点,以广东为例,南方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参与了该省今年的综合评价录取试点。这一录取模式参考学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按6:3:1的比例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录取。

专家认为,综合评价改革试点改变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有可能成为主流。但它与加分制度一样,也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制度进行监管。”(记者王凯晋、刘硕、刘奕港、廖君)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发挥高校智库和信息优势,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实际走访调查等多种手段,不让一个贫困生“掉队”,也不应让非贫困生“浑水摸鱼”挤占有限的助贫资源

据新华社南京5月25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赵久龙、张梓瑜)日前,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处正式公布了对该校非毕业班的4463名贫困生手机话费调查和处理结果,21人被取消贫困生资格,32人从家庭经济特殊困难降为一般困难,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江苏大学这一做法是自发的,扶贫办没有进行专项评估。“作为民间的一种说法、一种调查,这应该是允许的,但是要有全面综合标准。”

记者在江苏大学追踪采访了解到,该校根据手机消费情况对在库贫困生进行“资格再认定”的方式虽有争议,但学校采用“大数据+人工审核”的举措促进精准“识”“贫”,从而助力定向、公平资助。专家建议发挥高校智库和信息优势,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实际走访调查等多种手段,不让一个贫困生“掉队”,也不应让非贫困生“浑水摸鱼”挤占有限的助贫资源。

贫困生活费超标被“摘帽”

去年底,江苏大学非毕业班的4000多名贫困生收到通知——学校对贫困生库学生开展“资格再认定”工作,认定方式是学生本人提供当年10月至11月手机消费情况。统计显示:手机月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学生为4110人,占92.09%;在100-150元消费区间的,人数为289人,占6.48%;超过150元消费的人数为64人,占1.43%,极个别贫困生手机月消费额甚至超过了300元。

记者采访获悉,从2013年开始,江苏大学尝试以手机消费调查的方式对贫困生进行资格再认定,主要面向非毕业班。对月平均消费100元-150元的学生,建议采取降级处理;对月平均消费超过150元的,则建议取消贫困生资格。三年来,共有190名贫困生降低贫困等级,48人取消贫困生资格。

贫困生资格再认定,手机消费调查仅仅是第一步。学工处根据消费清单提供的只是初审参考意见,会不会降级或取消资格,最终取决于贫困生所在学院经过调查、约谈和群访后出具的具体处理结果。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辅导员范廷臣说,该院有380名贫困生参与手机消费调查,其中34人月平均消费超过100元。

“调查发现大部分同学确实有特殊原因,比如有的忙于创业,有的家庭遭遇变故,有的参加辩论赛查阅资料导致流量超出。”范廷臣说,对手机消费超标的每一位学生,学院一方面直接谈话,另一方面也通过学业导师、班级干部、宿舍舍友等多渠道了解情况。最终,34人中有6人降低贫困等级,3人主动要求退出贫困生库。

专项资金应花在刀刃上

江苏大学或降级或取消贫困生资格的“摘帽”行动引发了舆论热议。网友“上善若水”评论道,“贫困资金有限,必须将专项资金花在刀刃上。作为一名贫困生,月话费却无端超过150元,是完全有理由取消其资格的。”

江苏大学副校长李洪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贫困“资格再认定”的做法不是为了“卡”学生,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话费审查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对于话费超过150元的学生,学校还开展了包括调查、约谈、群访等进一步的甄别工作,不会轻易更不会随意降级或取消资格。”

李然(化名)原本是一般困难的贫困生,话费调查后她主动向学院申请退出贫困生库。“如果真的贫困,话费不会太多。”李然表示,自动退出是发现比她贫困的同学还有很多,她愿意把更多的受资助机会留给其他人。“身边大多数同学的月平均话费在60元左右,是足够使用的。学校对于话费划分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江苏大学学生代表董乾坤告诉记者,老师们也会定期了解学生的生活信息,对于参加学生工作或创业导致话费数额过大的学生,会让其书面说明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

“扶智”的同时也要“扶志”

专家认为,对贫困生资质的审查也不必局限于手机话费,可拓宽渠道,比如学生校园一卡通的消费情况和生源地走访调研情况等。“贫困不是错,贫困生的隐私和尊严更应该受到保护,静悄悄地数据分析方法比过去让贫困生登台演讲、拆苦‘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精神,也更有情味,体现了教育的人本精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程平源说。

“在未来,将大数据引入高校贫困生鉴定工作,还需借鉴更多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不仅要维护学生的尊严,也要保证数据的客观、真实和全面,要经得起推敲和监督。”江苏省教育厅资助中心主任陈虎说。

高校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识”“贫”。“只有精准识别贫困生,才能精准发力、精准帮扶。”长期从事学生资助的江苏大学学工处副处长吴立平说,目前,学生家乡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是高校贫困生认定的主要依据,但由于范围广、数量大、监管难,贫困生库难免掺入一些并非真正贫困的学生。

“贫困生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去看。”李洪波说,各地区横向比较的贫困标准不统一,但在高校又必须遵照同一标准来划线帮扶,工作过程中的确存在贫困生认定的公平问题。

此外,脱贫往往更为敏感、脆弱,自尊心较强,心理脆弱和经济脱贫同样重要,“扶智”的同时也要“扶志”。“千万不能让一困生变为经济、学习和心理都困难的三困生,不能让贫困生变为学困生。”李洪波说,贫困生资助工作不能只聚焦经济帮扶,要和学生的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帮助贫困生告别心灵的贫困,帮助他们成才,更为紧迫。